

# 质本洁来还洁去

徐小跃



《红楼梦》这部书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清人就曾有言：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鲁迅也说：《红楼梦》为人生不可不读之书。毛泽东更直谓：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小说写得最好的一部是《红楼梦》，它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如把上面这种说法与其他有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联系起来看，我想是十分有意义的。北宋著名的思想家邵雍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学不究天人，不足以谓之学。”鲁迅曾说：“不读《老子》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也就是说不探究天人之说的学问就称不上学问，如若知晓中国文化定要读《老子》。合而言之，真学问要究天人，说红楼；中国人要读《老子》，说红楼。唯其如此你才能真正知晓和懂得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就不仅仅从文学艺术的层面对《红楼梦》作评价。哪怕把赞誉文学作品所能用上的词汇都用上都不足以表征它的伟大。比如你说，《红楼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红楼梦》是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作者充分运用了我国书法、绘画、诗词、歌赋、音乐等各类文学艺术的一切优秀传统手法，展示了一部社会人生悲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上述这些评价都只局限在文学上，而没有站在文化的核心和基础的思想层面来观赏《红楼梦》。

我素来有这样的观点，文化有其层次性，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思想，而思想又包括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对所有艺术的层面对《红楼梦》作评价，只有站在这个高度，才能揭示出其深邃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我们研究《红楼梦》，要通过书中的人物、故事来深挖人性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而说到人性和生命也就涉及到了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了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道佛三家思想的问题。实际上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研究《红楼梦》一定要给予中国哲学的关照，给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关照。我们任何一位读者，只要留心一点，即会捕

观点摘编

## 王中江：“哲学”是一个“共名”

从世界哲学的整体来观察，“哲学”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张岱年从哲学的共殊关系上出发，认为“哲学”是一个“共名”。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都是它的一个“属”，都是它的外延。“哲学”术语源于西方，但“哲学”不等于“西方哲学”。若不同“类”的观点看问题，即使在西方也照样会出现使用“哲学”概念的困境。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从近代再到现代，每个时期的哲学都有其不同于前后的一些特征；从欧陆法国、德国到岛国英国，再到美国，不同的地域也有各自的形态。不能说只有哪一个时期的、哪一个地域的才是真正的哲学。

对“哲学”概念的界定，若以哲学家的界定为标准，可谓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的定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哲学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在于成为变革社会的直接催化剂；对于罗素来说，哲学位于宗教和科学之间，它的中心内容，一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一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或政治学说；对于石里克来说，哲学是服务于科学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哲学是“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乎寻常的发问”，既没有工艺和技术那样的实用性，也不可能具有促发一种历史状态的直接性力量。

摘自：2012年12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 刘士林：汉代文化本质上可以称之为行政文化

汉代行政构架有一种“简单的美”。在谈及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得失时，钱穆先生曾提出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即“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还是以相反。在他看来，古代最理想的行政构架是汉代，只有朝廷（中央）、郡（省）和县三级。府、州以上都是管官的官，县官是管民的官。“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主要的行政资源聚集在地方，所以汉代是“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的杰出代表。但这种地方政治架构，从宋代开始就变得不理想，明清以降更是何况愈下。

由于关注现实而不是内心、关注实务而不是玄学，所以汉代

## 曲星：国际舆论描述中国形象显示不同取向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逐步完善，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国际社会贡献越来越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由于西方媒体囿于意识形态偏见，戴着有色眼镜观察解读中国，且西方几大主流通讯社发出的新闻占了每日国际信息流通量的80%，因此国际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仍非常复杂甚至负面。但

文化本质上可以称之为行政文化。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本质特征。与西方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中国文化以解决人与社会（儒）、人与自身（道）的冲突为第一要务，其文化创造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家族秩序、人性教化等方面。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以是之故，在探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我们有必要注意和研究素朴、务实甚至显得有些呆板的汉代文化。

摘自：2013年1月21日《学习时报》

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客观事实毕竟无法抹杀，近年来另一种声音已开始出现。通过对近年来国际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和主要民间机构研究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描绘开始出现“两分法”的发展趋势。但从总体上讲，中国要建立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要在国际社会形成自己定义上的感召力和形象上的亲和力，任务还相当艰巨。

摘自：《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

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所有佛道二教的义旨都体现在《红楼梦》之中。

二

对任何一部名著的研究，最终要给人带来人性的呼唤和生命的提升。也就是说符合人性的对待是任何一部名著应该落实的最后制高点。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是做中国哲学的所以就读到了《红楼梦》的哲学意味。你这里就不能用大家熟知的鲁迅那段名言来加以判断。鲁迅曾说：“单就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红楼梦》的伟大是在于它具有了比任何一部小说都要高得多的审美意义，心性的意义、人性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当人透视了人之心性的本质、人性的光辉、生命的价值以后就会向着她应该趋向的目标前进。“质本洁来还洁去”难道不是《红楼梦》所要揭示的人生价值取向吗？这难道不是“还其本来面目”“返璞归真”这一佛道两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吗？

三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指出，就是如何将《红楼梦》作为一部“经典”来谈，来研究的问题。谈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经典”的性质。在我看来经典一定要具有以下的属性才能称为经典。经典要具有永恒性、普遍性、超越性、无限性，也就是说一本书作为经典它一定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具有永恒价值的一本书。说得通俗一点，它一定要“活”着，或说一定能够被“激活”，如此才能叫做经典。另外，我们为什么提倡所有人都应该读经典，因为经典为经典的一定是无限的解释空间。其中一定有你需要的东西。西方有句名言，是“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就说明一个经典需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面去进入。但在这里又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经典有无限性、超越性、普遍性，就可以对一部经典进行所谓过度的甚至野蛮的诠释。这是我们在做学问时向中所最要注意的地方。譬如，我们在研究老子时，对道家“自然”的解释问题你就不能

任意和过度解释。所谓道家的“自然”不是指与我们文化世界相对的那个自然界，老子、庄子所讲的“自然”并不是指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鱼虾等物体性的存在，而是指事物存在的状态。原来的样子、本来的样子、原来如此、原始状态即是老庄道家所谓“自然”的本义。《庄子·秋水》篇中说：“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什么意思呢？牛和马一生下来就有4条腿就是天，那就是自然；什么是络马首？就是给马搞一个轡头，给马配一个马鞍，再在马的4只脚上打4个马掌，还有人为了驾驭牛，在牛鼻处穿一个鼻环，叫穿牛鼻，那是对原始状态的破坏，那叫非自然，也就是“人”（人为造作）。

四

谈这个问题，是要为我们研读《红楼梦》引出一个方法论问题。时下在“红学”研究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现象即对《红楼梦》包括作者、版本在内的诸多问题作出许多令人哑舌的胡乱猜想。方法论要求的是科学、严谨、客观、求实、全面。“人人都有《红楼梦》”，不等于没有严肃的学术规范，更不等于可以做任意的比附和诠释。在《红楼梦》的研究当中，应该尽量避免对那些无价值和无意义的问题的讨论。诸如，对曹雪芹八辈祖宗生平事迹的考证，“通灵宝玉”是北京雨花石还是南京雨花石的考证，更有甚者对曹雪芹是男人是女人的考证等等。这统统属于多余。由此我认为在红学的研究中应该喊出“剪除多余且有害的文化”的口号，以净化红学的研究。

我们要唤起人们阅读经典的兴趣、激活经典的意义，并最终在心灵深处与经典“对话”。我始终认为对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所有堪称为经典的名著中的思想，都要进行符合现实、符合人性地创造性转化，以此实现我们精神境界的提升、心灵的净化和生命层次的提升。换句话说，如果读《红楼梦》，必须要跟心灵打通，必须跟生命打通，必须跟人性打通，以此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爱情观以及人生观。如果脱离了这样一个“大”者，那么任何的研究就是无意义和无价值的。诚如孟子所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作者系南京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教授）



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人高昌的新著《玩词牌》，这是一本介绍相关写作常识和技巧的书。诗人长期从事诗词写作和理论评论编辑，有丰富的创作体会和编辑经验。全书注重写作实践和阅读视野的扩展，主要分为七部分：“词学概说”介绍了词的前世今生，“填词基础”介绍了学习填词的基本技巧，“填词锦囊”详细介绍了100个常用词牌的具体写法，另外还在其他几部分中精选了一些范词和例句供读者借鉴。此书被称为填词实用教程，但仔细看来，这又并非一般的纯实用型说明性的写作指南，而是诗人煞费苦心、情思饱满地奉献给广大诗词爱好者的

一种心灵实录。有很多当代诗人都悲愤地感叹：中国已不复是诗歌的国度，大众已经远离了诗歌。我从来没有如此的悲观。我是从一种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诗歌的。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我觉得这既是一种已然，也是现实的主流。你只要想想，在汶川地震后那样空前悲壮的

## 《玩词牌》见性情

汾灵

但是，我要说，诗人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不仅仅是在于他赢得了诗歌的本真，适应了各种变化的样式，他确实对于每种方式都做了认真的考究和探索。即如本书而论，就生动地说明了在词这种诗歌体裁上，是怎样做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磨练的。与其说，他在有意识地为读者安排学习填词的次第和轻重，不如说他是真诚地把他本人体验和把握一种诗歌表达方式的过程坦然奉献给读者。正因为如此，这本26万字的著作，尽管包含了一个学习者需要的几乎所有必要的知识和关键的理论指导，你仍然觉得合自然，错落有致，读来如入园林胜景，移步总有可观，俯仰皆润胸怀。文如其人，诗人面对读者，一如他在生活中面对睦邻旧友，没有虚文，没有忌讳，似在瓜棚柳架下，执手谈天，热肠古道，兴味绵长。

诗人高昌就是这样一位不刻意偏私诗歌的各种知识性分别，而更用力于以爱心和性情去言说生命的人。我认真品读过他的现代诗，那种自觉的对思想的淬砺，那种热烈的对人生的拥抱，那种大地悲悯，那种燕赵慷慨，都在一种低姿态的平等言说中，娓娓进入你的胸臆。我也仔细咀嚼过他的文化无意识从根柢层面决定了儒家美学的柔性化色彩。

第四，中国审美文化的人格气质。任何思维方式都是深深地植根于独特的物质基础和民族特有的文化观中，这也是现代人类学所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中国古代理想的审美文化因素，尤其在人格塑造上都体现为偏于女性化的审美理想，这一点，无论从生物学、心理学还是现代人类学的角度，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印证。如果说西方几千年的父权社会发展出的是一种典型的刚性文化或男性化文化的话，那么，几千年中国父权社会的现实语境所学生和发展出的审美文化，其最具民族性的性格气质，在总体上却是偏于柔性化、女性化的。

第五，审美文化民族性的深层根源和形成机制。“母性崇拜”是铸造中国审美文化的关键所在，仪平策先生对“母性情结”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在人类历史由原始母系社

# 对中国审美文化现代性的探讨

——读仪平策《中国审美文化民族性的现代人类学研究》

吴鹏

从上世纪初的王国维美学开始，对西方美学的引进和借鉴一直是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的学术背景，百余年来，这个研究经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等数代学者的努力，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内容和中国美学独有的文化特色，亦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清晰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如何在借鉴西方美学理论的同时坚守本土美学的民族性和自主性的问题，也逐渐摆在了中国美学研究的面前。进入新世纪后，“审美文化”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新视点和新领域，同样，如何能够以中国本有的审美文化为核心，创造出既真正属于自己又兼收并蓄西方美学和交叉学科优秀成果的独立体系，也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这新一轮的发展态势中，仪平策先生的专著《中国审美文化民族性的现代人类学研究》取得了新的成绩，尤其值得关注的的是该书深入阐述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中国审美文化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实质内核，在审美文化上，它体现为一种独特的、自发形成的审美文化观念。本书指出，就中国审美文化而言，民族精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这就是持中致和的审美范式、缘情尚意的艺术观念、守雌致柔的美学理想、讲人伦重世俗的

化风尚、主内尚体悟的思维模式。仪平策先生认为，华夏民族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对社会制度和理想社会形态的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制礼作乐”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它以政治说教为目的，但在客观上萌生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审美标准——“中和”。在这个标准的影响下，阳刚与阴柔不是对立冲突，而是彼此交错、相互运用，浑融相继；不过，在具体的情境之中，“阴柔”却要甚于“阳刚”。仪平策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认为美就在现实的世界中，正是这种强烈的现实观念，造就了中国古代重视人伦、重视现实的审美文化观念。仪平策先生认为，中国审美文化在男权社会的背后保存了一种女性审美文化的倾向，在这“一显一隐”的文化建构中，女性化倾向成为中华审美文化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比如，无论是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古代还是在崇尚个性解放的近代，“慈母”形象都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感召力。在现实生活

中，母亲的意志总是能成为主宰儿女命运或者决定家庭事务的重要因素，这与西方社会女子毫无权利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仪平策先生还对“母性情结”在中国审美文化中的表现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他指出，“母性崇拜”现象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从宫廷内“母后”对于皇帝权威的干涉到武则天称帝，没有母性崇拜的观念而发生这一切是难以想象的。另外，在中国人极为重视的祭祀活动中，“大母神”女娲的形象被深深地镌刻在广大民众的心中。女性形象所代表的重生、慈祥与悯人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佛教文化中的观世音菩萨的形象也从男性逐步转化为女性形象。在中国人的想象世界中，“母性崇拜”深入到每一个层面之中。文学中的“慈母”形象已经固化到作品之中。在神话和宗教中，如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和道教中，以“三皇”降生为代表的感生神话，都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具有母性崇拜传统的直接证据。在各类本土宗教中，女性崇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古人对西王母与妈祖的崇拜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与中国人厚德重生的精神以及重视传宗接代的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三，父权社会、母性崇拜与中国美学。中国美学主要通过

“执两用中”的范式在审美活动中体现出一种“中和”之美。儒家思想虽然是父权制思想，但仪平策先生认为它本身也是一种用母性的方式来转述的“父系社会”的话语，虽然现实社会中的男女是不可能平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女性总是处于处处被压抑的状态；恰相反，母性崇拜的文化无意识从根柢层面决定了儒家美学的柔性化色彩。

向父权社会的普遍过渡和转化中，中国并没有彻底完成这一转换过程，从而导致了父权社会的“发育不良”甚至“先天不足”和母权文化的深刻遗留。因此，中国古代许多母系氏族社会的文化特征被保存了下来，使得中国审美文化具有明显的母性崇拜的特征。从形成机制看，仪平策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都是那种以“家国一体”所构建的封建制社会，因此在一切家庭和社会生活中都会受到“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加上中国“讲血缘、重宗嗣、主人伦”的传统，使得母性权威能够真正渗入到男权社会中去，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取向就是在这种机制的影响下形成的。仪平策先生从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民族精神”谈起，借鉴西方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提升和概括，并证之以深入发掘的大量一手历史材料。在当今市场化、西方化、学科交叉化的学术环境中，仪平策先生以其独到的探索，为中国美学和审美文化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仪平策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之融于现代性的问题，也做了很有意义的探索。总之，从源头上研究中国审美文化“偏阴”的特征是富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值得同行的注意。